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毛泽东传（下）

插图本

【俄】亚历山大·潘佐夫 著

卿文辉 崔海智 周益跃 译 崔海智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毛泽东传（下）

插图本

МАО ЦЗЭДУН

【俄】亚历山大·潘佐夫 著

Александр Вадимович Панцов

卿文辉 崔海智 周益跃 译 崔海智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传: 插图本/ (俄) 潘佐夫著; 卿文辉, 崔海智, 周益跃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8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石仲泉, 萧延中主编, 第2辑)

ISBN 978-7-300-21514-3

I. ①毛… II. ①潘…②卿…③崔…④周…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传记 IV. ①A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5632 号



国外毛泽东研究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毛泽东传 (上下)

插图本

[俄] 亚历山大·潘佐夫 著

卿文辉 崔海智 周益跃 译

崔海智 校

Maozedong Zh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 开本

印 张 59.5 插页 4

字 数 944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9.00 元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问 逢先知 龚育之 冷 溶 朱佳木
李忠杰 金冲及 石仲泉 李君如
李 捷 陈 晋

主 编 石仲泉 萧延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牛大勇	石仲泉	许纪霖	朱学勤
任剑涛	杜 蒲	张小劲	张 宁
张 鸣	李向前	宋新宁	周蔚华
郑 谦	庞 松	贺耀敏	高 华
黄嘉树	萧延中	景跃进	程 农

Мао Цзэдун by Alexander V. Pantsov

Copyright © Alexander V. Pantsov 2007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 2015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第六篇 “形式与结果”

第一章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453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化	480
第三章 斯大林、毛泽东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519
第四章 红色麦加之行	546

第七篇 斯大林对中国政策的影响

第一章 在朝鲜的冒险	573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的矛盾	594
第三章 社会主义工业化	604
第四章 伟大的转折点	621

第八篇 从斯大林化到毛泽东化

第一章 思想解放	635
第二章 “大跃进”	661
第三章 饥荒和恐惧	687
第四章 “海瑞罢官”	714

第九篇 最后十年

第一章 “造反有理”	739
第二章 红卫兵的悲剧	764
第三章 “571 工程”	785
第四章 孤独	801

注释	822
参考文献	871
专有名词中英文对照表	897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915
后记	925
译后记	928

第六篇

“形式与结果”

★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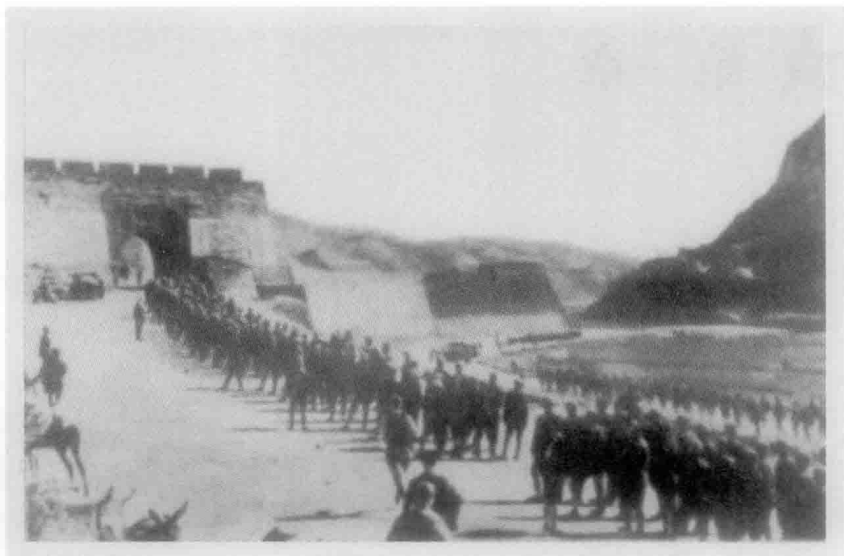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搬迁到延安给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他现在可以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所带来的舒适了。这个新的“红色”首都一点也不像保安。后者仅是个尘土飞扬的荒凉的小村庄，大多数房屋破败不堪。而在延安这个地方，生活充满了活力。“农民和小贩们在露天市场上出售肉类、鸡蛋、蔬菜和其他食品，”奥托·布劳恩回忆说，“小商店和饭馆，乃至一些非常正规的企业都还在正常营业。总之，延安处处透出一股安宁和正常的生活气息。这种画面对于我们来说是异乎寻常的。”^[1]

延安这座古城始建于公元前 2000 年。公元前 220 年，“天下”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开始在距中原 100 公里的北方修建万里长城，此举使这个城市的地位变得格外重要起来。那时的延安叫延州，在秦始皇以前一直是一个荒凉的小镇，而长城的修建使得它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活跃的商业中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地位逐渐下降，但始终不失为在中国本部和游牧民族生活的荒凉干燥的鄂尔多斯草原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延安地处一个狭长的山谷中，位于宽阔的延河南岸，河水不深且水中沙石很多。小城的四周都是黄土崂。巨大的、起着堡垒作用的城墙几乎把整个城市都围了起来。城墙上，一个个被女墙围起来的方形塔楼直刺蓝天。四个城门——一个北门、一个南门及一大一小两个东门——就在塔楼之下。城市的西边和西南边没有城门。在这两个方向，堡垒似的城墙沿着山脊蜿蜒伸展，保护着这座城市免受任何不速之客的侵袭。

从整体上看，这座城市是由狭窄而繁忙的街道、覆有弧形瓦顶

20 世纪 30 年
代末中国工农
红军部队在延
安城墙下。



的住房组成的多个呈长条状的街区，以及属于当地精英人物的奢华的花园式建筑和私人住宅所构成的。不过后两类建筑已被他们的主人抛弃了。环绕着这座城市的众多山峰中的一个山顶上矗立着一座优美的九层宝塔。此塔高耸入云，是这座城市最高的建筑。延安（字面意思是“长期的平安”）看来有希望给毛和他的同志们以期待已久的休养生息。与国民党之间的和平正逐渐成为现实。

3 000 多人居住在这座小城里，但还是有足够多的空房子，因此大多数党的领导人都能找到舒适的住所。毛泽东、贺子珍夫妇和其他中央委员及其妻子大都住在位于城西的凤凰山脚下。这一带原是本地富商和地主们聚居的一个高档社区，原来的房东们在听说共产党军队即将到来的消息后，自然都已在第一时间逃之夭夭。毛夫妇住进了一所富商的房子。洛甫、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分别住进了附近的房子。这些房子采光充足、宽敞且十分干净。从房间里远眺，呈波浪状延伸的一个个黄土岭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清晰可见。在毛的兼做客厅和卧室的那间房子里，挨着一个窗户，摆了一张很大的木制的床；在另一扇窗户下面，还有一个传统的、用壁炉里的烟加热的炕。除此之外，全部家具就是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几个书架及一个特大的木制澡盆。这里唯一缺乏的就是装文件的柜子，只好用几个空油桶来临时凑合。这些油桶是毛刚刚搬进这个屋子的时候

候他的卫兵们弄来的。这些油桶来自标准石油公司，毛就这样给他的中国家具添加了一点美国风格。^[2]

在城的北边，离城不远处，沿着延河两岸，在黄土质的群山的陡峭的山坡上有许多窑洞。一排排窑洞绵延十几里，远远望去就像是燕子筑的窝，又像是蝙蝠洞。^[3]大多数红军官兵就住在这些窑洞里。另外，也有几位中共高级干部宁愿住在窑洞里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而不愿享用“封建贵族”的奢侈住宅。张国焘就是其中之一。对于毛泽东及其同僚对他的不满，他的感受是越来越强烈了。

一位名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45岁的美国女记者于1月底或2月初来到延安。她是个持左派观点、举止颇有男子气、鼓吹女性参政、极端蔑视资产阶级道德、天真地崇拜斯大林的人。她也住在窑洞里。她不是任何一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但在此次来到陕北以前，她与共产国际和美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实际上，30年代初的时候，她曾扮演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中国的非正式代表的角色，偶尔也在共产国际特务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传递过前者给后者的金钱和指示。凭借着苏联军情特务理查德·佐尔格的一手安排，那时化名安娜的她也卷入了在上海的苏联间谍小组的活动。佐尔格当时的化名是约翰逊。1930年，史沫特莱成为佐尔格的众多情人之一。有那么几个月，这位被她称为“迷人的赫拉克勒斯”——她在给一位女友的一封信里就是这样称呼他的——的男人的非凡的魅力令她癫狂不已。来到延安后不久，史沫特莱就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被有礼貌地拒绝了。虽然她接受了中国朋友们对此的解释，但这一婉拒对她而言依然是一个打击。她的中国友人认为，作为一位有才华的记者，她最好还是保留党外人士的正式身份，那将能够使她为共产主义运动做出更大的贡献。^[4]

在史沫特莱隔壁的那个窑洞里住着她的译员、迷人的话剧女演员吴光伟，后者也是不久前才来延安的。史沫特莱叫她莉莉**，这个名字对她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26岁的莉莉面如满月，举手投足犹如百合花一样优美。她与史沫特莱之间的差异和她与所有其他居住在延安这个营地的“营员”的差异一样大。在延安的所有妇女中，她是唯一使用化妆品的人；她的化妆品数量还不少，都是她自

*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男性神，以力大著称。——译者注

** 西方女子名，英语中意为“百合花”。——译者注

己从西安带来的。她的又长又黑还烫卷了的头发像瀑布一样散落在双肩，煞是好看。她对自己的皮肤和指甲的护理也堪称无微不至。使自己形象出众的欲望驱使她有意违反大家都恪守的规矩。其意料之中的结果是，许多男人，包括那些已婚男人，都开始注意到她的存在。

毛也做不到对她的诱惑无动于衷。但从表面看来，他与莉莉的关系还是非常单纯的。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在有空的时候拜访这位迷人的女演员和她的邻居，几个人一起聊天，喝咖啡，吃苏打饼干，打牌，有时还喝点米酒。苏打饼干是史沫特莱带来的，她患有胃溃疡，因此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这种食品。虽然他确有几次留下来和她们一起吃饭，但他的举止还是得体的，没有试图与“吴同志”发展更密切的关系，看起来他只是欣赏这位正在为革命斗争做出引人瞩目的贡献的女演员的艺术才华。吴莉莉当时正在延安的舞台上主演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话剧，在剧中饰演尼洛夫娜。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延安城里开始出现流言。女人们（其中多数是已婚的）对这些流言尤其感到不安。作为活跃的党员，她们与其丈夫们一起经历过一系列艰苦的考验：内战、长征、国民党的封锁、饥饿、轰炸及与自己的孩子的生离死别。所有这些女人无一例外地自认为是革命的道德主义者，在她们的字典里没有“魅力”和“女性特质”这类词。花花绿绿的衣服、化妆品和时髦的发型只能招致她们的蔑视，与不熟悉的男人的无拘无束的社交在她们眼里几近通奸。她们的生活作风具有严格的游击队式的清教徒风格。她们与包括自己丈夫在内的男人们的关系是战斗中的同志关系。她们穿得和男人一样，剪着短发，做起事来非常谨慎但也非常独立。她们也不想在任何方面输给男人。说她们不像女人，恐怕并非夸张。

有鉴于此，吴莉莉对自己女性特质的张扬触怒了她们，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接着传来的，竟然是她与毛“私通”的消息！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给延安的妇女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与莉莉交往。终其一生，史沫特莱从未使用过化妆

品，她的衣着也和男人差不多，她从不装腔作势，她还一往情深地爱着共产党。但是，她的言行有点过分粗鲁、过分自信，也过分独立了。她信奉“自由的、革命的”爱情，拒斥婚姻，称其为奴役妇女的枷锁。她在会上发言时直言不讳，在窑洞里与男同志谈话动辄几个小时，还宣传生育控制技术。^[5]朱德的妻子、坚定而又充满活力的康克清尤其讨厌她。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开始为康的丈夫写传记，且对她的丈夫一见钟情。史沫特莱也不想掩饰她对朱德的感情，称后者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她以写书为借口，花了显然是太多的时间与朱德待在一起。

康克清和贺子珍是反对史沫特莱和莉莉的，不久后延安所有的革命妇女都加入了反对的阵营。可是，史沫特莱和莉莉显然对此浑然不觉。她俩继续与朱德和毛泽东会面，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他们。此时，延安还有两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是著名的共产党作家丁玲，此人也是一个观念彻底开放的女人；另一位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她的朋友们都称她“佩格”或“佩吉”。这个笔名为尼姆·威尔丝的美国女记者于4月底来到延安。她像好莱坞女影星一样迷人，但与那几位女人不同的是，她行事相当低调。不过，她还是经常出席史沫特莱举办的社交聚会，因为她看不出她们有什么不好。

显然，这些女人是在玩火。她们的聚会越来越频繁，毛常去看她们，给她们朗读自己新作的诗词（这时的他又开始写诗了），与史沫特莱谈论浪漫的爱情。把他们引向爱情话题的人通常都是莉莉。不久，她和史沫特莱一起产生了办一所交谊舞学校的念头。她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台老式的留声机和几张狐步舞唱片，在一座被废弃的教堂——该教堂的传教士们已经逃走了——里组织了一场音乐晚会。这种公开的“放荡行为”使中共领袖的妻子们深感震惊，引以为奇耻大辱，因而一致采取了视而不见这种引人注目的态度，但她们的丈夫大都欣然参加。朱德、周恩来和贺龙尤其活跃，认真学习美国式的舞步。就连苦行僧式的彭德怀也出现在了这场不寻常的晚会上，虽然他只是站在一旁观看。

7月至9月，这些女人陆续离开了延安。不久之后，贺子珍也

离开了。她就这样离开了丈夫和刚刚开始学说话的女儿，去了西安，借口是找个有条件的地方治伤。她体内的子母弹弹片确实令她不舒服，但取出这些弹片绝非她离开的主要原因。可也没有人说得清真实的原因。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伤处的疼痛恶化了她的健康，也使得她对毛的无伤大雅的娱乐活动做出了病态的过激反应。

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国内外形势迅速地变化着。

在整个1937年的上半年，斯大林不懈地致力于一个目标：使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式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这自然需要一大笔钱。在设法向中国共产党转移大笔资金的问题上，他一点也不吝啬。就在这一时期，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卷入了共产国际的秘密资金运作。她开始以“苏西夫人”的名义充当共产国际向中共领导人提供大额资金的中间人。比如，1936年11月，在收到毛泽东写给她的一封信言及中共的财政困难的信之后，她就帮助共产国际代表通过共产党人潘汉年提供的渠道，汇给中共5万美元。^[6]一封日期标明是1936年11月12日、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通知收报人说，已经决定为中共提供价值约55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共产国际执委会有意把这笔援助中的第一笔资金15万美元转给在上海的潘汉年，时间是11月底，中间人还是宋庆龄。1937年3月初，莫斯科答应把当年给中共的财政援助增加到160万美元。如果加上中共中央已经收到的两笔分别为15万和5万美元的资金，共产国际在1937年给中共的援助总额已经接近200万美元。^[7]

1937年3月10日，斯大林命令季米特洛夫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召回莫斯科。出于政治原因，后者当时被流放在乌拉尔地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大林认为，蒋经国对蒋介石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可能说服蒋介石认识到，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有必要与共产党人建立联系，因此决定把小蒋送还他的父亲。^[8]

蒋介石的儿子到乌拉尔也不是偶然的。1925年他到苏联的时候还是个16岁的青年，当时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热情正在高涨。他开始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学习，他的化名是尼古拉·弗拉基米尔·叶利扎罗夫。在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由于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他的思想转变很快，并加入了共青团。党交给他一

些重要任务，让他加入了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墙报《红墙》的编辑委员会。1927年4月，他对在上海发动的政变是如此的震惊，以至于他在大学的集会上同自己的“刽子手”父亲断绝了关系。他称自己的父亲为“中国反动派的血腥的刽子手”^[9]。后来他还说了更多类似的话。蒋经国是首批加入托洛茨基组织的中国大学生之一，他在这一组织中表现非常积极。^[10]但是在这一组织于1927年11月被摧毁之后，他同反对派断然决裂了——用他的化名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的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尼古拉·叶利扎罗夫“对我们积极拥戴托洛茨基的活动感到恐惧”^[11]。在一些同学的建议下，蒋经国写了一份同托洛茨基主义者决裂的正式声明。^[12]1927年年底从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毕业之后，他被安排到了列宁格勒的H. I. 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科学院。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同年轻的妻子、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离婚，他们是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结婚的。他们离婚的原因很简单：冯元帅也是“血腥的刽子手”。如我们所知，1927年6月，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冯元帅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也破裂了。蒋经国的妻子丝毫不懂政治，也不愿谴责父亲。后来，在1928年5月25日，她同自己的哥哥（顺便说一句，他也曾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冯洪国以及自己的妹妹冯弗发（兄妹俩都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化名分别是索比诺夫和索比诺娃）回到中国。^[13]

蒋经国则继续在军事政治科学院学习。1930年，从军事政治科学院毕业之后，他在莫斯科的狄纳莫工厂当了一段时间的钳工，然后参加了集体化运动；1930年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作为当时被党派去加强集体农庄建设的9000名党员中的一分子。他在1931年5月到11月担任莫斯科州科罗温村“十月革命”集体农庄主席。在此之后，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10月，他再次去学习，这次是到列宁国际学校读研究生。1932年他被派往乌拉尔，担任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第一机械车间的主任助理。1934年，他在这里认识了一位比他小七岁的金发俄国女郎、共青团员芳娜·瓦哈丽娃。这位姑娘当时是这家工厂的一名车工。1935年年初，他们结婚了，当时蒋经国已经是工厂的厂报《重型机械报》

的一名副编辑。一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埃里克出生了。1937年年初，蒋经国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委组织部副主任。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1937年初春，斯大林想起了他。蒋经国同芳娜一起被召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斯大林会见了，蒋经国发誓将坚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1937年3月28日，在返回中国的途中，他给季米特洛夫发了一份电报：“我在途中，谨向您致以最诚挚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您的所有指示都会得到执行。”^[14]

但是，在返回中国后不久，他的布尔什维克幻想马上就烟消云散了。斯大林在他身上打错了算盘，就像在他父亲身上打错了算盘一样。叶利扎罗夫不再履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中国反动派的血腥的刽子手”一下子变成了他所热爱的父亲。他受蒋介石的委托到了江西省，担任国民党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骨肉团聚了，儿子从俄国回来了。离散了12年，现在先辈们可以安心了。”后来，蒋经国在父亲的支持下飞黄腾达，在1975年父亲死后继承了他的职位。

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背弃了青年时的理想？谁知道呢？或许，他的一名传记作者B. И. 加利茨基的说法是对的：尼古拉·叶利扎罗夫对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早就感到失望了，他不过是在利用斯大林指派的任务，趁机逃离俄国。

因此，国共两党的协议并不是由蒋经国的回国所推动的，而是由国内政治局势的恶化所促成的。1937年春，日本加快了其在北平附近的兵力集结，且其驻军离北平只有几公里。这才是蒋介石于3月下旬在杭州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潘汉年进行面对面的谈判的真正原因。双方协定：中共保留对其武装力量的控制，兵员限额为三个师，计四万多人；共产党人将同以往一样控制着他们所盘踞的地地区的政府，同时也将接受来自南京的命令。^[15]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4月初批准了这个谈判结果。^[16]

1937年4月3日，蒋介石在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德米特里·博格莫洛夫进行了秘密会谈。^[17]作为他与共产党人结盟的交换条件，蒋想从苏联政府那里获得一纸向国民党提供军事物资的协定。与此同时，强烈的报复心驱使蒋罢黜了曾参与逮捕他的“西安的密谋